

博物馆里读中国

为弘扬中华传统吉祥文化,展现文物中蕴含的美好生活愿景,广州博物馆精心策划的“吉祥有年——广州博物馆藏吉祥文物展”于1月27日正式开展,持续至4月13日。该展览入选国家文物局与中央网信办联合主办的2025年度“博物馆里读中国—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”主题展览推荐项目。展览通过133件珍贵文物,以“福、禄、寿、喜”四大主题,诠释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精神追求。

展览分为“人臻五福”“天赐厚禄”“南山之寿”“欢喜盈门”四个单元,精选馆藏瓷器、玉器、珐琅器、纺织品等,众多文物首次公开展出,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中“讨彩头”的智慧。

人臻五福

中国福文化以《尚书》“五福”为源,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。明清时期福文化达至鼎盛,形成“图必有意,意必吉祥”的独特艺术语言。“福”字纹饰跃然于陶瓷器物,成为最直白的幸福宣言;蝙蝠纹谐音“福”,或写实或写意,与云纹、寿字交织出“福寿双全”的视觉诗篇;梅花五瓣暗合五福,寒梅报春传递生命轮回的哲学;佛手、寿桃、石榴组成的“福寿三多”纹,表达多子多福的世俗愿景;瓶中插牡丹寓意“平安富贵”,四季花卉绕瓶则寄寓岁岁安康,器物造型与吉祥意象浑然天成。这些吉祥纹样凝结着中华民族以物寄情、托物言志的审美智慧。

清道光粉彩通雕云蝠花卉纹瓷如意(图1)

此件如意造型沿袭清乾隆年间宫廷流行的“三镶如意”样式,为瓷质粉彩绘制加镂空工艺制成。器身三段分别镂空彩绘“五蝠捧寿”“三蝠捧寿”和云蝠纹,如意执柄分段作花卉蝙蝠纹样装饰,侧面绘蓝彩回纹,寓意“福寿延年”。整器工艺精巧,纹饰繁缛,造型流畅,雍容华贵,可谓匠心独运。

清光绪粉彩云蝠纹瓷瓶(图2)

此瓶首次亮相,口沿黄地如意云头纹尊贵雍容,通体以矾红彩绘蝙蝠纹穿梭于蓝绿黄紫四色灵芝云间,蝠纹圆润饱满,云纹如枝生四花,取“福满天地”“万福流云”之意。器底书红彩“大清光绪年制”六字双行楷书款。整个器身色彩绚丽喜庆,吉祥寓意鲜明。

清居廉牡丹寿石图立轴(图3)

这幅画以粉色盆栽牡丹为主题,牡丹后立一寿石。牡丹花朵呈胭脂色,采用没骨画法绘制,寿石则以浓墨勾勒轮廓,淡墨晕染,画面充满生机,呼应“富贵长寿”的寓意。题为“丁酉新年隔山人居廉”及铃印“古泉”表明画作创作于1897年新年。牡丹被誉为富贵花,其雍容华贵的形象常出现在文人创作的新年画作中,象征国色天香。

清乾隆“童子报平安”玉雕摆件(图4)

四位童子手持荷花、如意等吉祥物,围绕一只硕大的双耳瓶在波涛间嬉戏,寓意“报(抱)平(瓶)安”“送吉祥”。童子身躯圆润,虎头圆脑,五官生动,憨态可掬。人物与场景整体表现生动,极具感染力。

图4

天赐厚禄

鹿,作为禄文化的代表,以其温和的形象和与“禄”谐音的寓意,象征着财富与地位。葫芦则以天然形态暗合“福禄”双声,其浑圆饱满的造型与多籽特性,巧妙嫁接生命繁衍与功名俸禄的双重寓意,在明清葫芦瓶式器物中达到艺术表现的巅峰。这些意象通过陶瓷、纺织品等媒介代代相传,不仅展现了中国语言谐音转译的独特智慧,更深层映射着农耕文明对仕途经济、家族兴旺、自然时序的集体精神诉求,构成了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吉祥美学基因。

清乾隆广彩鹿纹大碗(图5)

此碗外壁装饰麋鹿、绵羊、钱纹等吉祥元素,主题纹饰为一对姿态各异的鹿在湖边栖息。鹿的形象写实,头部狭长如马,身体壮硕。广彩匠人运用浓淡不同的色彩和笔法,生动描绘了鹿的姿态、动作和毛发,展现了广彩瓷器吸收西方技法后的立体感和空间感。鹿纹常与蝙蝠、寿桃组合成“福禄寿”吉祥图案。

民国浅黄缎地蝠鹿桃花纹旗袍(图6)

这件旗袍正面绣着一只体态健硕、毛色亮泽的梅花鹿,回首栖于桃树下。桃树果实饱满,橙、红、紫三色渐变,非常诱人。两袖树梢与正面桃花枝下,仙鹤、蝙蝠绕枝飞舞。桃、鹿、仙鹤皆是长寿象征,“蝠”谐音“福”,鹿寓意禄,桃代表寿,这些图案相融,满满都是福禄寿全的美好祈愿。

『吉祥有年——广州博物馆藏吉祥文物展』赏析

于敏

图11

这幅通草片画描绘了元宵节灯火辉煌、百姓游玩的繁华景象。元宵节又称灯节,每逢正月十五,城中有花灯巡游、杂耍、猜灯谜等活动,画中儿童举着不同造型的元宵花灯在街上嬉戏。广州人临水而居,鱼虾等水产常见且被赋予吉祥寓意:虾象征节节高升、事业顺利;鱼代表年年有余;寿桃寓意健康长寿。

清同治粉彩喜鹊登梅图碗(图12)

“喜鹊登梅图”是晚清瓷器常见图案,喜鹊与梅花组合寓意“喜报早春”。《通典》称黄色为“中和美色”,象征大地承载万物。梅花为报春之花,早春绽放,与姿态各异的喜鹊共同构成吉祥纹样,传递喜庆与生机。

清铜胎画珐琅喜字宝相花纹温碗(图13)

此温碗用于食物加热与保温,原藏于紫禁城帝宫诚肃殿。通体宝蓝色地饰彩色宝相花纹及金“囍”字,碗底内饰五蝠捧寿纹。宝相花源于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化,融合莲花、牡丹等元素,形成复杂精美的团花纹样,寓意“吉祥富贵”,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。

以福禄寿喜为核心的吉祥文化,凝聚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,融合吉祥图案、工艺技艺与民俗信仰,承载千年历史,彰显民族审美。从宫廷到民间,从器物到节庆,吉祥文化以敬畏自然、崇德向善为底色,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,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希望和不懈追求。

清康熙青花八仙过海图瓷葫芦瓶(图7)

此瓶为上下小大的葫芦形,瓶口饰蕉叶纹,上腹部为花卉纹,下腹部设四个圆形开光,内绘“八仙过海”图,每个开光内绘二仙,开光之外满饰寿字。葫芦瓶寓意“福禄”,加上瓶腹密布的寿字,可谓“福禄寿”三全。

南山之寿

作为“五福”之首,“寿”不仅象征着对生命永恒的期盼,也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追求中。展览通过精美的文物,展现了“寿”这一主题在中国文化中的深远影响和独特魅力。每一件展品不仅是对长寿的美好祝愿,更是中华民族生命意识和审美情趣的生动体现,让观众在欣赏艺术之美的同时,感受到中华文化对生命的尊重与颂扬。

清同治粉彩花卉开光“万寿无疆”碗(图8)

此杯设计精巧,寓意深远。杯身四面饰以圆形开窗,窗内分别书有“万”“寿”“无”“疆”四字,字体端庄典雅,寓意万寿无疆,表达了对长寿的美好祝愿。开窗内以万字锦为地纹,象征吉祥绵延不绝。杯身以黄地为底,色调尊贵典雅,其上绘有缠枝花卉蟠桃纹,蟠桃乃长寿之象征,缠枝花卉则寓意生生不息。其间点缀蝙蝠纹饰,因“蝠”与“福”谐音,进一步增添了吉祥福寿的意蕴。整件器物纹饰寄托了对生命长久、福寿双全的深切祈愿。

清光绪帝三旬寿辰赐给督抚大臣扇(图9)

生于1871年的光绪帝,于1901年迎来了他的三旬寿辰。这是此次寿辰赐予督抚大臣邓华熙的纸本黑漆描金折扇,扇骨边刻“百寿”,描画细腻、刻工精致,是清代皇帝寿辰赐礼的珍贵遗存。

清嘉庆青花釉里红寿桃形壶(图10)

此壶造型别出心裁,呈寿桃之形,寓意美好。壶身的红釉,巧妙地点染出寿桃顶端的独特形态,色泽鲜亮,栩栩如生。流身与壶身相连之处,匠心独运地以枝叶形状进行贴塑粘接,线条流畅自然,尽显生动写意之趣。尤为特别的是,此壶采用了倒装壶的设计,别具一格,工艺精妙。

欢喜盈门

“喜”是中国吉祥文化的核心,象征喜庆与喜悦,贯穿于人们追求快乐的活动之中。不仅有结婚生子之喜,还有节庆之喜,凡带来欢庆之事皆可称“喜事”。

历史上,人们以喜鹊、麒麟等动植物组合图案表达吉祥如意,如“喜上眉梢”“麒麟送子”,寄托了对喜事临门、繁衍幸福的美好期盼,成为传统工艺美术中独特的装饰纹样。

清元宵花灯巡游通草水彩画(图11)

这幅通草片画描绘了元宵节灯火辉煌、百姓游玩的繁华景象。元宵节又称灯节,每逢正月十五,城中有花灯巡游、杂耍、猜灯谜等活动,画中儿童举着不同造型的元宵花灯在街上嬉戏。广州人临水而居,鱼虾等水产常见且被赋予吉祥寓意:虾象征节节高升、事业顺利;鱼代表年年有余;寿桃寓意健康长寿。

清同治粉彩喜鹊登梅图碗(图12)

“喜鹊登梅图”是晚清瓷器常见图案,喜鹊与梅花组合寓意“喜报早春”。《通典》称黄色为“中和美色”,象征大地承载万物。梅花为报春之花,早春绽放,与姿态各异的喜鹊共同构成吉祥纹样,传递喜庆与生机。

清铜胎画珐琅喜字宝相花纹温碗(图13)

此温碗用于食物加热与保温,原藏于紫禁城帝宫诚肃殿。通体宝蓝色地饰彩色宝相花纹及金“囍”字,碗底内饰五蝠捧寿纹。宝相花源于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化,融合莲花、牡丹等元素,形成复杂精美的团花纹样,寓意“吉祥富贵”,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。

以福禄寿喜为核心的吉祥文化,凝聚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,融合吉祥图案、工艺技艺与民俗信仰,承载千年历史,彰显民族审美。从宫廷到民间,从器物到节庆,吉祥文化以敬畏自然、崇德向善为底色,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,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希望和不懈追求。

金石器作为一种文化遗存在清代中晚期得到阮元、张廷济、刘喜海等一些文人仕宦收藏家的高度重视,而晚清陈介祺的藏器品种之富之精最为时人称赏。陈介祺(1813—1884),字寿卿,号篹斋,二十岁左右开启了他的金石人生,五十余载倾心致力于金石古器的鉴藏考释和传拓赅续,其成就可谓是传统金石学发展历程上的一座丰碑。

百余年过去,篹斋藏器历经沧桑四散海内外,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有缘珍藏了一批篹斋考释手稿及金石拓本。手稿系篹斋后人于1964年捐赠,入藏当时的文物博物馆研究所(现文研院前身),包括近30种金文考释稿,31通尺牍自留底稿、6篇传古笔记,以及刊行前手稿《秦前文字之语》《封泥考略》等,尤其是周毛公鼎、孟鼎、聃毁、郅钟等吉金重器的各金文考释稿,是篹斋作为金石学家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见证。院藏篹斋藏器拓本品类较齐全,拓工亦较精。从制拓的侧重来看,有重在记录器物真实形态的吉金全形拓、重在记录文字的金石文字拓两类。其中商周秦汉170多器的全形拓,见证了篹斋在传拓古器图像上的传承与创新。院藏更多的是文字拓本,品类多、数量丰富,包括200种商周金文拓本以及秦诏量权、汉器、铜镜、泉范、秦汉瓦当、古砖、古陶文等文字拓本。这些金石拓本的来源主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文物主管部门从市肆收购而得,并拨交文博所收藏。

2017年至2019年,笔者以文研院立项课题研究“院藏陈介祺金石学资料整理研究”(编号2017-JBKY-13)为契机,全面调查了篹斋藏器拓本,分门别类进行鉴别、整理和研究,分为商周吉金彝器全形拓、商周吉金彝器文字拓、商周兵器、秦诏量权、汉器、铜镜、泉布泉范、秦汉瓦当、古砖、古陶文十种,并汇为《陈介祺拓本集》,有关情况简述如下。

商周吉金全形拓及文字拓本

《商周吉金彝器全形拓》收录篹斋藏商周彝器139器的全形精拓本,体现出篹斋藏器的核心面目,其底本主要源自院藏善本《篹斋藏吉金拓片》(登录号00995)。笔者认为此部图籍当是篹斋本人存留的藏器全形拓图档,非常珍贵。这一推断有几点依据:

装帧考究精美。全套五册,书衣木框锦缎面封护,内叶以纸墩制成折叶,每器墨拓对开托裱其上。

有墨笔行书于毛边纸的器目5纸(图1)。其中,有的器名下用双行小字标注该器的来源、出土地、真伪意见等。有2纸的篇末还分别写到:“照目检器再编目”“全图必以栗园为宗而更求精”。从上述信息及书写笔迹来看,此5纸当是篹斋手书草目。

5纸目录的列器与拓本基本相对应,总计有商周137器、秦1器、汉29器、晋1器,篹斋疑似3器。目录中提及一件疑似宋伪器“密豆,疑宋崇宣器”(图2),此器全形拓背面题“崇豆”。另2件疑似器见于折叶背面题记。

有两册在折叶背面有墨书题记。记器名、页码(从二至八七),有的还注明器的来源、辨伪意见。写有“刘”字的,是得自刘喜海旧藏,计有21器,其中2器题写的鉴定意见分别是“益公钟疑陕伪”(图3)“双耳壶字伪”(图4);另写有“叶”字的,是得自叶志诒旧藏,有师袁敦、丙申角。

拓本制成时间及拓工不一。有一幅在整纸上、采用拓与墨描相结合工艺制成的楚公蒙钟图,系六舟拓(铃印“六舟手拓”)(图5)。其传拓工艺与审美风格与册中的分件钟等拓本不同。还有一幅“颂鼓”文字拓本铃印“陈栗园手拓”(图6),当是陈畹所拓。这两幅当是篹斋42岁之前居京时与六舟、陈畹交往时留下的早期拓本。同治十年(1871年)后,篹斋在经历青齐乱世后决意将所藏以传拓方式来保存传播,使持续延请拓工助拓,在全形拓工艺上,采用陈畹的分纸缀合拓法,而更求精。册中有一幅楚公蒙钟文字拓,便是出自篹斋之手,有铃印“陈寿卿手拓吉金文字”“陈氏吉金”“陈介祺所得三代两汉吉金记”(图7)。

鉴此,笔者推断此套拓图,当是篹斋选编、具有记录和收藏性质的一部吉金全形拓图档。这些拓本非常珍贵且稀见,呈现了篹斋眼中吉金所具有的端庄、文雅和古朴之气韵。

本次辑刊的篹斋全形拓《商周兵器》,有戈、戟、剑、矛等66器,不仅数量齐全,且每器皆拓两面,拓工精雅。拓本的底本主要源自院藏图籍《篹斋藏铜器拓片》(登录号01027)(图8)。

篹斋重视三代金文,强调精拓多拓以传世。此次辑刊的《商周吉金彝器文字拓》有199种金文精拓本,包括部分彝器残片的文字拓,是《商周吉金彝器全形拓》中所没有的。文字拓的底本亦主要源自院藏图籍《篹斋藏铜器拓片》。

秦诏量权拓本

篹斋收藏秦器,源于他对开后世小篆之始的秦相李斯遗迹的看重。篹斋最早所得秦器是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获藏一块出自关中的秦诏铜版,同出的另外4块归刘喜海。同治五年(1866年)刘氏的4块旧藏亦归篹斋。他认为铜诏版是嵌于木量的遗存,诏字为李斯之迹。之后的八九年,篹斋又陆续入藏了秦始皇及二世诏字的木量铜诏版,铁权和铜量,这大大激发了他欲集秦相李斯之迹成大观的迫切愿望。他认为秦金石文字“虽不及钟鼎文字,然暴秦忽焉,柔豪之法,实始于此,不可不重也”。

篹斋的秦诏文字收藏中还有一种作为量器的陶器,即瓦量。他对秦瓦量的辨识和定名,在其《秦诏瓦量残字》拓本册中的光绪三年(1877年)“丁丑七月十六日”长题里有详细记载(图9),还曾在光绪三年七月七日将新得的“秦始皇瓦量残字四片拓四”寄赠吴大澂。此后几年间,篹斋又陆续入藏了一些秦诏瓦量残片,如光绪四年(1878年)十月又收得2片。他收藏秦诏瓦量的总数,据现存多个拓本册的对勘来看,共有33种。

(下转7版)

图7 楚公蒙钟文字拓、篹斋铃印

图8 梁伯戈拓本

辑刊《陈介祺拓本集》

赫俊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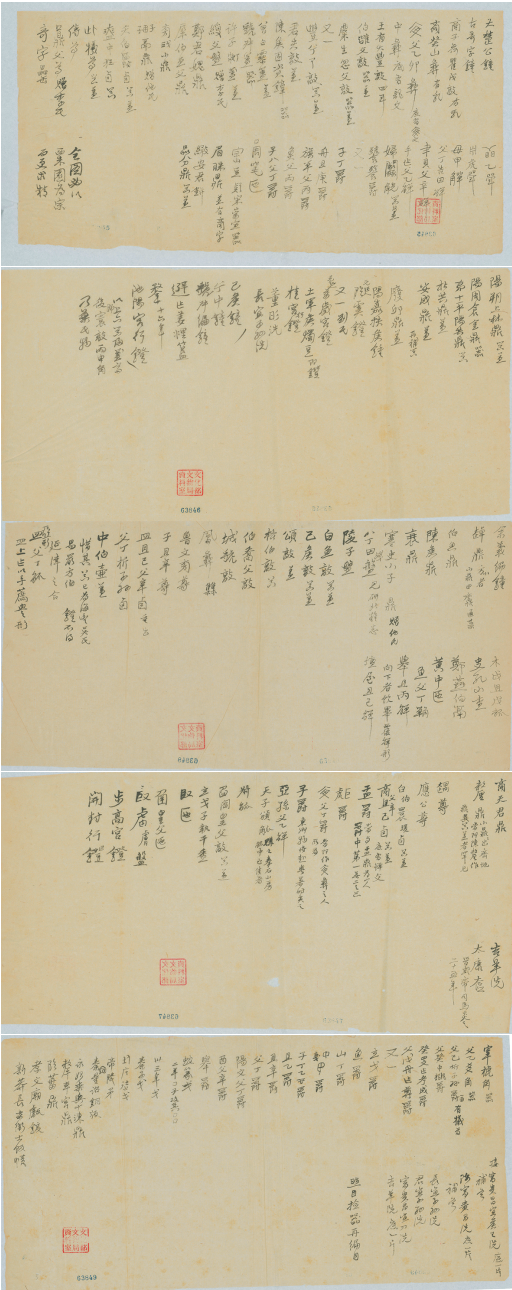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《篹斋藏吉金拓片》目录5页



图2 篹斋疑似器密豆全形拓及背面题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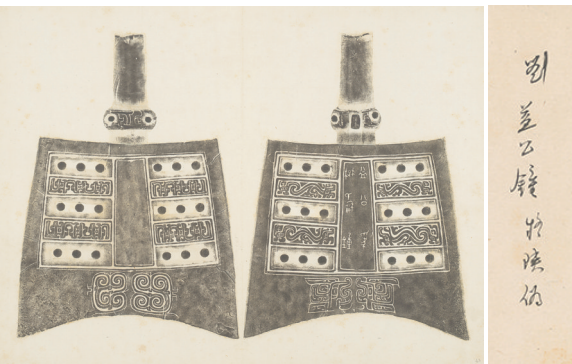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益公钟全形拓及背面题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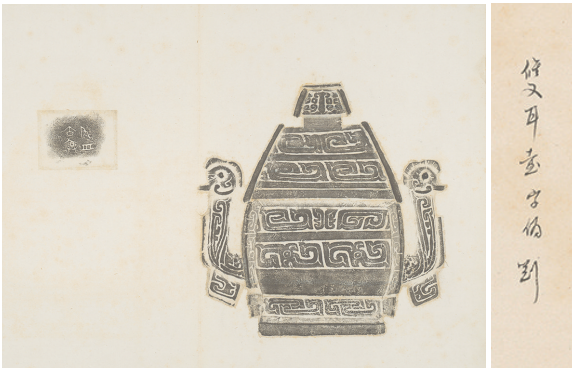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双耳壶全形拓及背面题字



图5 楚公蒙钟全形拓、“六舟手拓”印



图6 西周颂鼓全形拓、“陈栗园手拓”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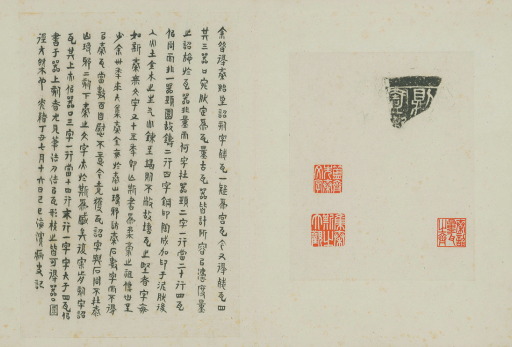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9 秦诏瓦量残片拓本及题记